学术专论

# 18世纪中期中俄关于黑龙江通航及阿睦尔撒纳等逃人问题的交涉

## ——以勃拉季谢夫使团来华为主线

叶柏川　师佳琪

[摘要]　18世纪上半叶，俄国政府多次组织对西伯利亚东北和北太平洋地区的考察，对黑龙江的兴趣与日俱增，遂于1756—1757年派勃拉季谢夫使团来华交涉通航问题。勃拉季谢夫使团来华，正值清朝平准战争的关键节点，准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及汗哈屯乌梁海诸宰桑逃入俄国。清廷对逃亡首领势在必得，俄国则一再收纳逃人，导致中俄关系出现激烈动荡，使团最终未能达成使命。此次通航与逃人问题的碰撞，为后续的一系列问题埋下伏笔。

[关键词]　清代　中俄关系　黑龙江　通航　阿睦尔撒纳

[中图分类号]　K249.3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4）－03－0107－14

航海大发现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相继凭借海洋称霸世界。俄国虽为内陆国家，但走向海洋是其不断开疆拓土的原始动力之一。[①] 1640年代俄国哥萨克推进到黑龙江[②]流域，在此后两百多年间，夺取黑龙江流域出海口成为中俄博弈的重要内容。尽管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黑龙江流域为中国领土，但俄国历任政府从未放弃谋取黑龙江流域，并在政策上呈现出惊人的连续性。[③] 18世纪上半叶俄国政府组织了多次对西伯利亚东北和北太平洋地区的考察，对黑龙江的兴趣与时俱增，遂于1756—1757年精心筹划了勃拉季谢夫（В.Ф. Братищев）使团来华交涉通航问题。勃拉季谢夫使团来华，正值清朝平定蒙古准格尔部的战争（以下简称“平准战争”）的关键节点，阿睦尔撒纳在逃，中俄边境极为动荡。清廷对逃亡首领势在必得，俄国则一再拒绝交出阿睦尔撒纳等各类逃人，导致中俄关系出现波折，使团最终未能达成使命。

[收稿日期]　2023－09－03

[作者简介]　叶柏川（1974—　），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北京100872，zhaofc@sina.com；师佳琪（1999—　），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2，1835023498@qq.com

① 在欧洲，俄国常年与瑞典、土耳其争夺通往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出海口，在亚洲，则体现为争夺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

② 黑龙江的俄文汉译为“阿穆尔河”（Амур）。

③《沙俄侵华史》对彼得一世政府以降俄国对黑龙江流域的谋取做了详细梳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6−87页。

勃拉季谢夫使华事件，是俄国谋求黑龙江流域通航权的一个重要历史见证，而这一时期频繁发生的逃人交涉问题，又是两国在欧亚大陆核心地带激烈角逐的体现。中俄竞争在东西两个场域同时展开，二者之间相互影响。但是勃拉季谢夫使团来华选择的时机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国内研究成果中极少提及，中文史料中也鲜有记载。[①] 2011 年前，相关俄文史料和研究成果也相当有限。[②] 2011 年，俄罗斯出版了《18 世纪俄中关系》文件与资料集第 6 卷，收入勃拉季谢夫使团档案 93 件，细致呈现了使团的背景、筹备、出使及交涉过程。因 18 世纪俄语在解读上存在难度，这些档案尚未见国内学者利用。关于这一时期的阿睦尔撒纳交涉问题，以往论著虽有提及，但依据的史料主要以《清实录》《宫中档》等汉文官书档案以及汉译的《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 年以前）》等为基础，述之不详，对准部问题衍生出来的乌梁海逃人及喀尔喀蒙古逃人问题则鲜有提及。[③]2023 年 10 月出版的《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1736—1776），刊布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的满文月折档及俄罗斯档，呈现出大量逃人交涉的细节。本文以勃拉季谢夫使团俄文档案及清俄往来文书为基础，通过中俄档案互证，再现 18 世纪中期两国关于黑龙江通航及逃人问题的交涉。

## 一、黑龙江通航交涉的背景

彼得一世（1672—1725）统治时期，俄国开始真正走向海洋，在争夺波罗的海与黑海出海口的同时，也积极向东方寻找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通航黑龙江是俄国走向太平洋的重要环节，俄国历届政府对黑龙江流域的谋求一以贯之。1689 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两国边界以额尔古纳河和格尔必奇河及外兴安岭为界。以此为据，黑龙江处于中国境内。但俄国始终认为俄方代表是在清朝军事压力下被迫将黑龙江左岸让与中国，因此谋取黑龙江一再成为俄国政府讨论的议题。彼得一世本人很早就对东方国家中国和日本感兴趣，1717 年大臣萨尔蒂科夫（Ф.С.Салтыков）曾建议他在黑龙江入海口与中国和日本实现通航。[④]1731 年，恰克图谈判俄方代表萨瓦（Сава Владиславич–Рагузинский）在《中国的实力和情况的秘密报告》中称，俄国可以用中等常规军事力量夺回缔结《尼布楚条约》时“让出的所有俄国土地”，但是夺取黑龙江绝

① 乾隆朝实录中略有提及，在李静杰主编的《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1736—1776）（商务印书馆，2023 年）中有几份档案涉及交涉结果，但对具体交涉过程未曾涉及。部分相关研究成果略有提及该使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 2 卷；张维华、孙西：《清前期中俄关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年；王希隆：《中俄关系史略（1917 年前）》，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

②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出版的《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系列论文集有几篇专题文章，但囿于篇幅和资料，无法呈现使团之行折射出的清俄关系全部细节。Саркисова Г.И.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о миссии В.Ф.Братищева в Пекин (1756—1757гг.)». XXI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Тезисы и доклады. Кн.2. М., 1990. С.76–83. Саркисова Г.И. «Российский дипломат В.Ф.Братищев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к библиографии)». XXII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Тезисы и доклады. Ч.3. М., 1991. С.115–119. Хохлов А.Н. «К историии миссии Братищева в Китай(1756—1757). » IX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Тезисы и доклады. Ч.2. М., 1978. С.96–101. Саркисова. Г.И. «В.Ф. Братищев и его миссия в Пекине в 1757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3. №3.

③《卫拉特蒙古简史》（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 年；刘亮、张文德：《试论中俄交涉阿睦尔撒纳事件》，《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2 期；武明明、薛晓东：《清朝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期间的中俄交涉》，《山西档案》2019 年第 2 期；谈汀：《乾隆朝俄属乌梁海越界问题研究——以观念史视角为中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 年第 1 期。

④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VI. 1752—1765 / Отв. Ред. С.Л.Тихвинский. М.: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11. С.7.

非易事。[①] 1732 年，多次来华的商务代表郎克（Л.Ланг）建议利用清朝平准战争之机夺取黑龙江。[②] 但因受制于欧洲战事，俄国未能采取实际行动。直到 18 世纪中叶，通航黑龙江问题被再次提上日程。

为促进在西伯利亚的拓殖，开辟通往勘察加和美洲的海路，俄国政府在 18 世纪上半叶多次组织对西伯利亚北部地区的大考察。[③]1753 年，俄国政府决定重启第二次勘察加考察。接受任务的西伯利亚总督米亚特列夫（В.С.Мятлев）提醒枢密院，[④] 为使考察顺利进行，必须解决俄国船只通过黑龙江向鄂霍茨克和勘察加地区运送物资的问题，因当时陆路交通不便，物资运输价格高昂。[⑤]1753 年 7 月 6 日，伊丽莎白女皇通过枢密院谕令外务衙门向清廷提出通航黑龙江问题，以保证对亚洲东北海岸俄国属民的物资供应。由于黑龙江入海口不在俄国控制之下，枢密院要求约束船上服役人员不得对中国属民有所冒犯，但另一方面则强调通航势在必行，“根据睦邻义务，只要提出自由航行的理由是正当的，即使这些要求未被允许也没有必要搁置通航”。[⑥]

该问题在枢密院、外务衙门和西伯利亚总督之间进行了反复讨论。12 月 28 日，枢密院责令外务衙门立即向清廷提出通航要求，同时要求米亚特列夫详细考察黑龙江河口西南的土地，搜寻尚不了解的东部、东北和东南地区，获取白令发现的勘察加东南土地，在黑龙江口建造要塞和船厂，打造配备大炮的巡洋舰，或以武力强制当地民族归顺俄国，或与之签订商约。[⑦]

关于是否同时向清廷提出自由通航和在河口建厂，外务衙门担心同时提出会引起清廷怀疑俄国企图占领黑龙江并侵入中国领地，因此听从米亚特列夫的建议，先派人前往尼布楚，[⑧] 确认能否在与额尔古纳河连接的因果达河上找到合适地点建造船只，[⑨] 并获取关于黑龙江深度的准确信息。如果深度足够便在那里打造船只，无须向清方提起于黑龙江口建造船厂和要塞之事；如果水深不够，再提起此事。米亚特列夫指派海军军官索伊莫诺夫（Ф.И.Соймонов）考察了从伊尔库茨克到尼布楚的陆路和海路，寻找在尼布楚附近建造海船的合适位置，并绘制了地图。[⑩]1756 年 12 月 21 日，枢密院致函清朝理藩院，正式告知将派遣信使勃拉季谢夫出使中国。[⑪]

被任命为信使的勃拉季谢夫，在出使中国前曾任俄国在波斯的驻扎官，具有一定外交经验。[⑫] 需要说明的是，俄国曾经向北京派遣的使节包括特别全权大使、专使和信使三类。外交信使在当时级别很高，通常是为了谈判某个具体问题而派遣。[⑬] 余绳武等指出，勃拉季谢夫名义上只是一名信使，实际上却被授予同清廷谈判“黑龙江问题”的权利。[⑭] 陪同勃拉季谢夫前往中国

---

① 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394–395 页。

②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Т. VI. С.7–8.

③ 18 世上半叶两次最著名的考察分别是 1725—1730 年白令考察队进行的第一次勘察加探险和 1734—1743 年的北方大考察。

④ 枢密院，俄语为“Сенат”，清朝文件中直译为“萨纳特衙门”。

⑤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Т. VI. С.375.

⑥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Т. VI. С.37.

⑦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Т. VI. С.35, 86, 87.

⑧ 俄文称之为“涅尔琴斯克”，“Нерчинск”。

⑨ 原文如此，但此处额尔古纳河应为鄂嫩河，鄂嫩河与因果达河汇合后注入石勒喀河。而相应中文史料也书写为“额尔衮河”，即额尔古纳河，应是从俄文文件中转抄。中文文件可见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2卷，第117页。

⑩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Т.VI. С.382.

⑪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Т.VI. С. 63–65.

⑫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Т.VI. С.32.

⑬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Т.VI. С.13.

⑭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 2 卷，第 35–37 页。

的 И. 雅各比（И.В.Якоби），1753 年曾前往北京递送文书，其父 В.В. 雅各比（В. В.Якоби）是当时掌管边境事务的色楞格斯克卫戍司令，在中俄交涉中扮演重要角色。① 使团首席翻译，是曾经作为传教团成员在北京学习语言的索赫诺夫斯基（Е. Сохновский）。② 使臣携带的所有文件由外务衙门准备，包括给理藩院的国书。但因《恰克图条约》规定两国往来文书应在枢密院和理藩院间进行，清朝官员对此严格审查，枢密院要求使节绝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他们是由外务衙门派遣，而非枢密院。③

国书首谈黑龙江通航事宜，提出居住于俄罗斯帝国东北海岸堡寨和岛屿上的驻军和居民，因从西伯利亚内部地区获取物资极其困难而处于极度饥馑之中，为此需要通过中国皇帝治下的黑龙江向其运送物资，请中方出于两国永久和平和友谊允许俄国船只通行，告知俄国女皇已经命令西伯利亚总督在尼布楚打造船只准备通航，通航人员将不会对中国属民造成任何困扰，请求中国皇帝将允许通航的谕令交予信使，由其转交西伯利亚总督向中方边境官员出示。④

枢密院叮嘱勃拉季谢夫绝不可向中方透漏勘察加考察之事，提醒他为达到目的可以向促成此事的中国大臣和罗马神父赠送礼物，如果中国极力反对，应解释说俄国船只通航黑龙江绝无其他目的，但同时也要告知清廷，即使未得清廷允许，俄方依然会派遣船只，配备武装，向东北海岸运送物资，因为这是唯一道路，但是这些话应在中国人拒绝俄方要求后再讲出，因为带有威胁色彩。⑤

对于当时正在进行的清朝平准战争，枢密院仅在给使节的训令中简单提及，要求他“打探中国有多少军队，中国与准噶尔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断传来消息说，准噶尔首领达瓦齐和大部分准噶尔人已经臣服中国，应打探他们居住在哪里，剩余的准噶尔人由谁来统治，是否臣服于中国人”。⑥ 对于清廷关心的阿睦尔撒纳及乌梁海逃人问题，并无具体交代。

## 二、阿睦尔撒纳等清朝逃人的产生及清俄的各自立场

勃拉季谢夫使华，正值清廷平定准部的关键时刻，大量战争逃人逃往俄国。清廷聚焦于对准部逃人阿睦尔撒纳及汗哈屯乌梁海宰桑德木齐等人的穷追不舍，俄国则因担心清廷对准部及哈萨克的控制而积极招纳逃人。逃人事件为勃拉季谢夫出使蒙上阴影。

勃拉季谢夫于 1757 年 3 月 4 日从托博尔斯克出发，⑦ 8 月 29 日到达北京俄罗斯馆。但就在他来京前几天，修士大司祭阿姆弗洛希（Амфросий）从天主教神父戈比利（Гобель）处得知，乾隆皇帝在 8 月份收到枢密院 5 月 20 日关于清廷索还准部逃人阿睦尔撒纳问题的回文后大怒，命令“用粗暴的言语回复”，准备派遣大军前往俄国边境，并一度后悔允许信使来京。⑧

准噶尔部于 17 世纪上半叶崛起于中国西北，是满洲人的强大对手，清廷历经康雍两朝未能将其彻底打败。1755 年乾隆皇帝趁准部内乱派军出征。阿睦尔撒纳在与噶尔丹策零之子达瓦齐的同盟瓦解后投向清廷，但清廷平定达瓦齐后仅册封其为辉特部汗，使其成为卫拉特诸部之主的愿望落空。失望之余，阿睦尔撒纳叛清。乾隆皇帝大怒，重新聚集大军征讨。阿睦

①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T.VI. C.40, 376.

②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T.VI. C.379.

③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T.VI. C. 55.

④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T.VI. C.63–65. 国书中译本见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106–107 页。

⑤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T.VI. C.58.

⑥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еке. T.VI. C.60.

⑦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T.VI. C.160.

⑧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T.VI. C.171.

尔撒纳战败后逃往哈萨克阿布赉汗处，但很快因担心被执交清廷而再次出逃。阿睦尔撒纳复叛令乾隆皇帝痛恨不已，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四月初四日上谕中痛斥定西将军策楞贻误战机：

> 览今日策楞所奏，俱非紧要事件。其如何擒拿逆贼阿睦尔撒纳，及遣人前赴哈萨克之处，并无一言奏及。其意以为既至伊犁，大事已毕。不知伊犁地方自去岁已经平定，伊等到彼与否，原无关系，唯擒拿阿睦尔撒纳乃为要务，伊等理应竭力往擒，期于必获……使策楞等当时即行奋力直前，则阿睦尔撒纳自必就缚，何能奔轶？……今逆贼果至逃窜，伊等复有何颜见朕耶？且伊等从前折内尚有奏及遣人前往哈萨克去之说，今乃并无一言，反将逃出之人诉称阿睦尔撒纳逸去时，将哈萨克使人阿布赖之弟岳尔博罗斯并留于准噶尔处之俄罗斯使人陂罗和乐等带去等语敷衍具奏，其意若谓逆贼阿睦尔撒纳既将哈萨克及俄罗斯人带去，其势若不见容于哈萨克，必将投赴俄罗斯，索取既难，便可中止。不知逆贼必将穷追，无论其逃赴哈萨克、俄罗斯，即更任其所之，亦必当前往擒捕，焉有中止之理！而策楞等辄有难色，是诚何心？……着传谕策楞等……务将阿睦尔撒纳擒获。①

乾隆皇帝的态度奠定了清廷处理阿睦尔撒纳问题的基调，即“逆贼必将穷追”，“期于必获”，这一态度为日后勃拉季谢夫使团的中俄交涉冲突埋下伏笔。

实际上策楞并非毫无作为，就在乾隆皇帝发布上谕后两天，远在伊犁的他令被阻于当地的俄国商人费奥多尔等人带回两封分别以大清国定西将军和理藩院名义致俄萨纳特衙门的信件，告知近年来准噶尔部众自相残杀，清廷出兵戡定准部、拿解达瓦齐后，阿睦尔撒纳欲居准噶尔总台吉之位而发动叛乱，杀害驻伊犁将军大臣，乾隆皇帝震怒之下派军剿捕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兵败窜入哈萨克，现清军已到达哈萨克边界追捕，推测阿睦尔撒纳得知清军抵达哈萨克后唯恐被拿送清廷，可能逃往俄罗斯，请俄方按照“所定十一款条约”(《恰克图条约》) 将其拿送。②

清准战争是发生在亚欧大陆腹地中亚地区的重大事件，此时俄国势力已经迫近中亚草原并在额尔齐斯河流域修建多道防线，奥伦堡和托博尔斯克当局一直密切关注清准局势及准部与哈萨克的关系。③ 1755 年，在判断清廷势必用兵准噶尔后，西伯利亚地方高度戒备。驻防司令克罗弗特建议外务衙门不要接收战争逃人，担心清军会追踪逃人出现在俄国，而俄国在上额尔齐斯河以及其他防线要塞的兵力非常有限。但是随着局势发展，俄国政府的态度发生转变，首要原因是对清廷征服准部和哈萨克的担忧。俄国在西伯利亚与中亚地区兵力薄弱，因此更希望在身边维持一个独立而不甚强大的准部，对于哈萨克与准部关系，则既不希望二者发生冲突，也不愿意看到二者联合。但俄国更担心的，是聚集在准噶尔的清军征服两部。1756 年 6 月 26 日，西伯利亚总督米亚特列夫提醒彼得堡，如果清军征服准部和哈萨克，俄国边区处境将极端危险。于是政府转而要求地方当局接收包括准部在内的各类清朝逃人，“直到 1758 年络绎不绝”。④

清俄在中亚地区的争夺自此拉开序幕。清廷最看重的是准部，将准部领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视为其西北疆域，其次是汗哈屯乌梁海地区，该地位于清俄交界地带，清廷于 1756 年青衮杂卜事件后开始在此编旗设佐，有效管辖。⑤ 至于中玉兹哈萨克，1757 年夏阿布赉汗遣使奉表内附清朝，⑥ 与清廷长期保持松散的藩属关系。俄国对准部及汗哈屯乌梁海逃人的接收引发严

①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65–66 页。
②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66–68 页。
③ 两地分别是俄国在中亚草原与西伯利亚地区的行政管理中心。
④ 伊·亚·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马曼丽译，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 408、425 页。
⑤ 樊明方：《清朝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管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 年第 2 期。
⑥《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 41。

重的中俄纠纷，在此后几年内，追索逃人首领成为两国频繁交涉的主题。首要逃人无疑是阿睦尔撒纳，其次是汗哈屯乌梁海部郭尔卓辉等人。逃人纠纷背后，是两个庞大帝国对准部及乌梁海领地所有权的争夺。

早在 1751 年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被喇嘛达尔扎击败后前往哈萨克避难时，俄国政府就注意到他们，要求奥伦堡当局尽可能招抚二人前往奥城。① 1756 年 7 月初奥伦堡当局派遣通晓准部语言的阿勃杜尔·卡斯金诺夫前往阿布赉汗处偷偷向阿睦尔撒纳传递招降书。② 很快阿睦尔撒纳从阿布赉汗帐逃至中俄边境，派人送书乞降。俄边界长官兼陆军上校伏兰茨基 1757 年 1 月 6、7 日连续修书两封，表示女皇已下令接收率领属下脱离清朝之准噶尔宰桑，但阿睦尔撒纳所修书信“仅口称愿降”，需先订立投降书再予接收，要求阿睦尔撒纳或亲自前去或出具明据。③ 但这两封书信被与准部作战的参赞大臣富德缴获，同时缴获的还有伏兰茨基招降逃入俄国的乌梁海部宰桑郭尔卓辉之部下德木奇爱西克的书信。不过清廷并未立即反目，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初六日理藩院致文俄枢密院，告知截获俄边境长官的招降书信，但同时给俄方留足面子，称“我国与俄罗斯所定之条约，双方皆不容隐逃犯一项甚明。盖或因俄罗斯长官素念此节，方留下阿睦尔撒纳所派之人，以诱擒阿睦尔撒纳解送前来亦未可知”。随即则特别强调阿睦尔撒纳不同于他人，若偶入俄罗斯，要求“务必按照所定之友好条约，拿送前来”。④

除了阿睦尔撒纳，清廷索要的逃人还包括汗哈屯乌梁海宰桑德木齐、郭尔卓辉等人，以及潜在逃人喀尔喀蒙古和托辉特部首领青衮杂卜。汗哈屯乌梁海原受和托辉特部节制，其部宰桑被清廷授予顶戴花翎。青衮杂卜与阿睦尔撒纳交好，指使乌梁海人支持阿睦尔撒纳。兵败后，德木齐、郭尔卓辉等人率众逃入俄国。清北路军追至俄界卡伦，索要汗哈屯乌梁海宰桑鄂木布之子勃洛特等人。俄边境长官回复乌梁海人已进入俄国，不予给还。乾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理藩院去文说明德木齐等已为大清国属民，要求俄方按照所议条约不相收纳捕逃条款将之遣回。为示友好，清方将被准噶尔俘虏之俄罗斯所属 64 户护送遣回。⑤ 十月十五日，理藩院再次行文索要郭尔卓辉等人，告知本应按两国条约将逃人全部索回，但念及这些均系去年平定准噶尔之际所收降之人，不比旧属，援引阿睦尔撒纳处理方式，仅请俄方交出宰桑郭尔卓辉、鄂木布等为首之人，其下属人员及物件，由俄方留用。⑥ 但就在 1757 年 1 月 5 日，俄边境长官伏兰茨基以宰桑郭尔卓辉的名义致书招降其留在中国境内的部属德木奇爱西克。⑦ 另一方面，喀尔喀蒙古地区也暗潮汹涌。青衮杂卜于 1756 年夏率领喀尔喀牧民发动撤驿之变，兵败，同年年底在与俄罗斯交界处杭哈将噶斯地方被清军擒获。⑧ 其间清廷也曾致书枢密院，要求一旦青衮杂卜窜入俄国，按照规定将其遣送。⑨ 此外，一部分喀尔喀蒙古部众密谋归附俄国，勃拉季谢夫在日志中几次提到在往返途中接见要求归附的部众，他与雅各比趁机招抚，但这场归附俄国运动最终因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二世离奇死亡不了了之。⑩

---

① 伊·亚·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第 409 页。

② 伊·亚·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第 425 页。关于此事，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也有记载，见第 68 页，但具体日期有所不同。

③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83–84 页。

④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81–82 页。

⑤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69 页。

⑥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76–77 页。

⑦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84 页。

⑧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79 页。

⑨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70–71 页。

⑩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T.VI. C. 191, 205–206. 森川哲雄:《外蒙古的归属俄罗斯运动与第二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张永江、叶雪冬译,《蒙古学信息》1995 年第 2、3 期。

## 三、勃拉季谢夫在华期间黑龙江通航与逃人交涉的碰撞

勃拉季谢夫使团来华时正值中俄逃人交涉的高潮时期，清廷根据“两国所定十一款”互不收容逃人条款索要逃入俄国之清朝部众首领，俄方一面避而不答，另一面则积极招降阿睦尔撒纳和汗哈屯乌梁海头人。在此背景下，清廷收到俄国请求信使勃拉季谢夫一行12人入境的公函。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傅恒等奏报，查得“原定十一款内，所谓捷报使只派一二人者”，但“伏思为今正值办理准噶尔事宜之际，因有逃入俄罗斯者，曾数次行文索还。今据悉，贼阿睦尔撒纳复欲入俄境。此时，恰有俄罗斯人前来，若能抵达后向该等人交涉此事，讲明道理，则更为有益”，建议“委妥员照顾俄罗斯所派之人速行递文前来”。乾隆皇帝批复：“从速行文，着速送来。”①

清廷很快收到俄萨那特衙门拒绝拿送阿睦尔撒纳等人的回文，落款日期是1757年5月20日，主要内容如下：准噶尔地方原为异部，并非大清国或俄罗斯所属。1731年托时出使俄国时曾声称，清军出征准噶尔时，若有准部众逃入俄罗斯，俄方可以接收，“惟将其中部落宰桑拿送前来，其余人等可以容留”，但此次清军出征准噶尔时并未通知俄方，“故收来降者，亦未曾重视”，今对此事，亦只按与前使臣商定之处办理。指责1756年清大臣率军2000于吉拉万城附近索取准部宰桑逃人，俄边界长官拒绝给还，清军竟违背条约，持械冲入俄界。强调逃入俄方者，是因内争不睦，又遭清军杀戮至流离失所，此人等进入俄罗斯后，经立投降书才被接收。狡辩称：“今凡我人员，若到尔方，而尔方又予收留，在此情形下，我方决不毁坏睦谊。我方对于诸如此类由他处逃来或我人逃往他处者，从不追究，均按友好之道办理。”又提及1701年，土尔扈特阿玉奇汗之子三济扎布带往准噶尔处20 000人均被收留，如清方索回准噶尔人，应将以上诺颜宰桑等20 000人交还俄国。关于清方欲派兵前往哈萨克、吉尔吉斯追捕阿睦尔撒纳，则称该吉尔吉斯、哈萨克为俄罗斯所属，清方派兵非友好之举。接下来否认阿睦尔撒纳在俄境：

> 现今委实不知该阿睦尔撒纳在何处。即使逃入我界，阿睦尔撒纳亦并非实属尔方。然尔方谓之无妨友好之道而加索取。无论如何，按照两国所定友好条约而行为好。我方之意，当阿睦尔撒纳入我界后，即按友好关系送回尔方亦易，唯有一件难办之处：今处之流传大清国已占准噶尔地方，俄罗斯国已暗中容隐准噶尔人，大清国已声言向俄罗斯国索取此等人员等情。然我方并未容隐准噶尔，此纯属流言，不可为信。我仅相信前使、侍郎托[时]所称，俟平定准噶尔后，再议关于让给我俄罗斯一点地方之言。②

俄方拒绝交出阿睦尔撒纳并伺机索要准部土地，又称哈萨克、吉尔吉斯为其所属，阻止清军前往两地追捕阿睦尔撒纳，于是出现上文提及的勃拉季谢夫抵达北京后从阿姆弗洛希处得知的一幕。乾隆皇帝极为震怒，命理藩院复文枢密院，对俄方言辞一一驳斥：

> 该鄂木布、郭尔卓辉等乌梁海宰桑，乃降服于我，经朕恩授以总管，赏赐顶戴花翎，已为我属，此怎可谓由他处逃去乞降者？再，前往准噶尔地方之土尔扈特，乃三四十年前之大事，而且我大军前进，伊等即降，后因背叛，将其该杀者杀之，该留者留之。伊等均系早已去准噶尔之人，于目前所议之事毫不相干。为今若重提此事，则布里雅特、奈玛尔人等，原来均为我喀尔喀之旧属奴婢，现在亦应将之归还我方。此皆旧事，何必再提？再，准噶尔地方，乃朕派兵平定，俄罗斯等怎可派兵查拿？伊若派兵，我将军大臣等又怎能依得？吉尔吉斯系于去年被我军剿灭，哈萨克亦被我军击败，逃至数千里之外。若果真为伊所属，能不知此乎？此怎可谓之为伊所属？实乃毫不相干。再，阿睦尔撒纳派人去伊界，因其将所派之人扣留，故阿睦尔撒

①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2卷，第85页。

②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2卷，第96–99页。

纳亦决无去处。今被我大军追剿，已无计可施，擒在旦夕，亦无需请俄罗斯擒拿。倘若逃入俄罗斯，伊等理应拿送前来，为此，方符友好之道。再，从前出兵时，曾向伊等晓谕，平定准噶尔后，拟将少许地方与之，此特因其俄罗斯居于边界一方，念其可有助于我而为此晓谕。然前次出兵，伊并未协助，故此次出兵，未曾晓谕。至所谓给与少许地方，伊丝毫未予协助，为何给与之？……

> 尔方又称我大臣率兵二千余人，进入尔界，至吉拉万城附近，以图一并取之，只是因尔长官等行文后，方为停止云云。我大臣率兵追捕鄂木布、郭尔卓辉者是实，然其进入尔界，会见尔长官时，乃本和好之道，仅带几人前去交涉。若果真率兵二千余人前去，为何不曾擒获鄂木布、郭尔卓辉？此纯属无中生有之事。[①]

复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 索要阿睦尔撒纳；2. 否认俄方所称哈萨克、吉尔吉斯为其所属；3. 强调准噶尔、乌梁海已为大清所属，郭尔卓辉等乌梁海宰桑为清廷授予顶戴花翎之官员，必当归还；4. 不允许俄方军队进入清属准地追索先前阿玉奇之子三济扎布所率土尔扈特人；5. 驳斥俄方所称清军 2000 人持械进入俄界；6. 清廷出兵准部俄方并未予以协助，因此让与俄国少许准部地方无从谈起。这是中俄关于西北地区逃人问题的第一次双方对话，二者各自亮明立场。清廷宣示对准噶尔和乌梁海等地的主权，表示主权领土范围内的主犯逃人必须追索，否认俄国对哈萨克、吉尔吉斯拥有主权。[②]

回到勃拉季谢夫出使，清廷本来认为勃拉季谢夫一行作为信使人数超出规定，但因急于了解俄方对准部问题的态度，破例允许入京。乾隆皇帝对俄使到京前收到的枢密院回文大失所望，但仍然抱有一线希望，试图从俄使处获得官方公函以外的信息。勃拉季谢夫到京后，内阁和理藩院派人询问他是否有公函之外的内容相告，勃拉季谢夫执意表示见到要员才肯转达。此时乾隆皇帝正率领百官在木兰围场行猎，理藩院安排勃拉季谢夫一行 6 人前往距京 300 俄里的喀喇河屯（Хара–Хото）与乾隆皇帝安排的官员会面。同日，罗马传教士戈比利给俄使传来讯息，告知乾隆皇帝得到在准地作战将领关于阿睦尔撒纳未在俄境的奏报，龙颜大悦。[③]

此事是指一等侍卫顺德讷奏报拿到俄国边界官员书面出具的关于阿睦尔撒纳未在俄境的公函。理藩院很快致函枢密院跟进：

> 今为擒拿阿睦尔撒纳事，我将军大臣等，已各处派兵缉查。哈萨克阿布赖亦感戴朕恩，遣使归降，并将与贼阿睦尔撒纳同往之宰桑达什车凌、齐巴干等人解送前来。又奏称仍派人于各处缉查阿睦尔撒纳……今贼阿睦尔撒纳已不能复入哈萨克，加之我大军严加缉查，擒在旦夕。惟贼阿睦尔撒纳迫不得已，万一窜入俄罗斯，则应即行拿送前来。

理藩院表示，“索伦之吉尔噶勒等二百人，虽入俄界，然均系闲散之人，并未赏有官爵，毋需查送”，但“其封官爵之郭尔卓辉、鄂木布等人，均系赏有顶戴花翎者，应按原议不互相收纳逃人之例，不得留于彼处。不过亦仅解送其为首者，其余属下可由俄罗斯人掳取之”。[④]

复文传递几层信息：一是阿布赉已经臣服清廷，并配合清廷缉拿阿睦尔撒纳；二是阿睦尔撒纳唯一可去之处应是俄国，要求配合缉拿；三是再次表示对阿睦尔撒纳以及乌梁海头人追捕到底的决心。

勃拉季谢夫被允准来京。借助其出使日志，可以大致了解接下来的交涉过程。9 月 8 日，勃

---

①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2 卷，第 93–95 页。

② 与俄国联系密切的是草原西部的小玉兹阿布勒海尔汗家族，1822 年 7 月俄国颁布《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才将中玉兹地区（额尔齐斯河以西以南至巴尔喀什湖以北）彻底并入俄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施越：《俄罗斯草原征服史：从奥伦堡到塔什干》，东方出版中心，2023 年，第 48、77 页。

③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T.VI. C.172–174.

④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2 卷，第 100–101 页。

拉季谢夫被安排出发前往喀喇河屯。在遭遇极端雷雨天气情况下，清朝官员仍护送他们一路疾行，只为赶在 9 月 14 日乾隆皇帝诞辰之前到达，因为届时一切事务将停止 3 天。勃拉季谢夫判断，乾隆皇帝急切想知道公函之外由他传达的内容，因为无论在是前往北京的路上还是在此次行程中，清朝官员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打探。如中方翻译向索赫诺夫斯基询问，是否俄国人已经捉住阿睦尔撒纳，是否准备将之遣还中国。索赫诺夫斯基则避而不答，称阿睦尔撒纳不在俄国。9 月 11 日到达热河，勃拉季谢夫被告知前往宫廷，翻译索赫诺夫斯基同行。清朝方面的代表是来保（赖保）和瑚图灵阿等。勃拉季谢夫陈述了俄方要求，包括通航黑龙江运送物资，清方派遣满洲人员到边境与俄方领队调查蒙古人越界偷盗案件，接收 6 名俄国留学生在京学习，清朝皇帝派遣专使祝贺俄国女皇登基等 4 项，并未提及准部及逃人问题。在了解俄方意图后，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傅恒出面与俄使会谈。勃拉季谢夫反复强调通航黑龙江的必要性。傅恒表示，通航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因为江两岸居住着大清国索伦部属民，俄船通航时，分属不同国家的陌生民众难免发生争执，从而影响两国关系。勃拉季谢夫回答，只要清朝皇帝命令当地索伦部众在俄船通行时不得拦截滋事，部众自然遵从，俄国女皇也将严禁俄人有任何不良行为，安静和平地通行黑龙江。他又提及大量欧洲船只到达中国港口，长期与当地人进行贸易并居住，也未发生争端。傅恒回答，尽管放行俄船是小事，但需要细致商讨并禀报圣上，由圣上定夺。[①]

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勃拉季谢夫在日志中辩称，当俄国要求被拒绝后，他本可以声明，即便未得清廷允许，俄船依然会通航，并在必要时动用武力，但他认为这对俄国没有好处，只会提醒乾隆皇帝加强黑龙江布防。据雅各比探得的消息，乾隆皇帝阅毕枢密院文书后说道：狡猾的俄国，一方面毕恭毕敬，另一方面却声称已做好通航准备，即使未获允许仍将行动。勃拉季谢夫认为，如果他当即表明俄国将强行通航，只会令乾隆皇帝确信自己的想法，因此选择没有说出，以便俄国在采取行动时可以突发制人，从而将俄国船只通航阻力减至最小。[②]

9 月 13 日离开喀喇河屯回京路上，理藩院司员乌洛（Улой）私下告知勃拉季谢夫，乾隆皇帝最终裁定，拒绝俄国经黑龙江运送物资。9 月 25、27 日，满文翻译弗洛赫（Флох）和姜傅（Гянфу）交给索赫诺夫斯基两封给枢密院的复函，分别以满语和俄语书就，还有一封根据皇帝谕令书写的关于阿睦尔撒纳的文书，后者原件被当即发走。[③] 回文称：

> 经由黑龙江运粮一事，向来未准，断然不能依允。不但所定十一款内无此项规定，而且我双方边界之人甚众，其间或有无知小人，偶生事端，反无益于友好之道……皇上既降谕旨，毋庸另议。至于尔方所咨拉丁文书内所称，尔方之饥民甚苦，恐成饿殍，似此之事先前亦曾发生等语。此类事件，先前并未有过。若论似此借道而行之例，尔方先前亦曾阻止我派往土尔扈特之使臣借道尔国，未准通行。此虽系已往之事，惟今尔方所咨文书内，因书有先前曾有此事等语，本院方才提及尔方曾阻止我方前出使土尔扈特之使臣一事。[④]

清廷强调通航可能造成双方属民纠纷，并援引 1731 年德新使团前往土尔扈特受阻之例拒绝俄船通航黑龙江。乾隆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大学士傅恒奉上谕寄信黑龙江将军绰尔多等，要求严禁俄船通过黑龙江，并警惕俄方强行通航。[⑤]

10 月 4 日勃拉季谢夫离开北京原路返回，11 月 14 日到达恰克图。[⑥] 12 月 13 日，勃拉季谢夫在色楞格斯克无奈汇报，称无论他怎样竭尽全力，“满洲统治者以其极其罕见的傲慢对他的极

---

①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T.VI. C. 174–177, 181–182.

②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T.VI. C. 187–188.

③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T.VI. C. 186.

④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2 卷，第 103 页。

⑤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2 卷，第 117–118 页。

⑥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T.VI. C. 191.

度遗憾不予理会"，拒绝俄国通航黑龙江。①

勃拉季谢夫多方打探中国方面拒绝俄国通航的原因。戈比利神父在将俄国来文从拉丁文翻译成满文时，曾通过大司祭阿姆弗洛希告知他，通航有可能被允许，似乎乾隆皇帝对反对通航未置一词。但是在勃拉季谢夫与中国大臣会谈后，皇帝决意调查此事。而戈比利在将回文翻译成俄文时，又通过大司祭告知，因俄国船只通航黑龙江为获取某种贵重珍珠而未被允许。另一位西吉兹穆特（Сигизмунд）神父则认为，拒绝俄国人是担心他们在通航过程中侵入中国领地。勃拉季谢夫判断，中国皇帝不允许通航的原因，是担心俄国人在航行过程中侦察黑龙江另一侧，而后逐渐占领中国领有的黑龙江沿岸地区，像占领雅克萨一样。②

奇怪的是，勃拉季谢夫似乎并未将通航被拒与准部问题联系在一起。他仅仅提到清廷将因准部问题对俄国产生的不满，发泄在对他们一行的接待、供给和遣返等细节上，如俄罗斯馆便安置诸多守卫，清方人员寻找各种借口不放人进入，等等。③ 而且从勃拉季谢夫的日志中，并未看到他与清廷直接探讨准部问题的记录，双方在喀喇河屯的正式会谈主要围绕信使肩负的 4 项使命，重点是黑龙江通航和清廷派遣使团问题，似乎双方都未提及准部问题。

但是勃拉季谢夫日志中透漏的很多细节，彰显着清廷对准部及阿睦尔撒纳问题的高度重视。在前往喀喇河屯的路上，清方人员多方打听阿睦尔撒纳是否已在俄境，俄国是否准备将其拿还。清方翻译多次向俄方翻译索赫诺夫斯基透漏清廷对待准部问题的态度。在从喀喇河屯返京路上，翻译弗洛赫与姜傅向索赫诺夫斯基透漏，乾隆皇帝极其不满枢密院复文，因此使团在前往北京途中被另种对待，严加看管。但不久前，在前线领兵的中国将领奏报，俄方边境人员书面确认阿睦尔撒纳不在俄国，这一讯息令乾隆皇帝心绪有所平复。此后 9 月 12 日，两名翻译又私下告诉索赫诺夫斯基，乾隆皇帝最初打算施以信使特别恩典，曾下令将他们从张家口直接带到热河，在宫廷赐宴，听取汇报后，再让他们从热河前往北京，满足他们的需求，但因先于信使到达的枢密院公函，一切礼遇都被取消。④ 9 月 29 日索赫诺夫斯基向信使汇报，他在修士司祭索夫罗尼（Софроний）处见到中方翻译弗洛赫。私下交谈时，弗洛赫"略有醉意"地聊起了枢密院公函，告知如果俄方不交出逃入俄国的阿睦尔撒纳等 3 人，乾隆皇帝将派遣四路大军进入俄国进行捉拿。傅恒曾奏称，当下世间诸国皆臣服于"中央之国"，只余俄国，俄人不可信，他愿率大军平定俄国。弗洛赫询问索赫诺夫斯基是否会将此事告知勃拉季谢夫，索赫诺夫斯基回道："此事非同儿戏，能否发生未可料知，不敢禀报。"弗洛赫冷笑一声说，"或许你对我有所隐瞒，但我料定你定会禀报。参赞了解甚好，他回去后可提醒萨纳特衙门，也许贵衙门畏惧，将重新考虑此事"。⑤ 不难看出，中方翻译等人员有意无意透漏的讯息，应是在乾隆皇帝授意下对俄使的旁敲侧击，暗示准部及逃人问题在清廷对俄态度上造成强大张力，对此次出使有着关键性影响，从使节被允入京，到在京所受待遇，以至最终谈判结果等各个环节 。

还有一个细节，是首席会谈大臣大学士傅恒对俄国的态度，他在与勃拉季谢夫会谈时明确表示坚决拒绝俄国通航黑龙江。弗洛赫曾提到傅恒向乾隆皇帝进言俄国不可信任，并请命率军荡平俄国，捉拿阿睦尔撒纳。从这两个细节不难看出傅恒对俄国有着十分顽固的不喜。而勃拉季谢夫在日志中又谈到乾隆皇帝对傅恒宠极一时："尽管名义上他让政府管理国家，但实际上，他的决定更多是听从其宠臣傅恒，汗在所有国务上都无条件信任他，对其言听计从，除了其母

①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Т.VI. С. 202.

②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Т.VI. С. 188..

③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Т.VI. С. 190, 200.

④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Т.VI. С. 184–185.

⑤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Т.VI. С. 193–194.

亲、皇子、舅舅和兄弟，无人获此殊荣。”① 由此不难想象傅恒对乾隆皇帝决策的影响。上述戈比利神父也曾告知信使，最初乾隆皇帝并未表示反对通航，但是会谈后乾隆皇帝决定慎重对待此事。由于所见中方史料未记载清廷决策的具体过程，尚无直接证据说明阿睦尔撒纳问题对清廷拒绝俄国通航黑龙江产生了决定性作用，但种种迹象表明，前者是影响后者的重要因素。

勃拉季谢夫在华期间，关于阿睦尔撒纳的交涉依然在进行。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定边右副将军兆惠奏报，俄边界长官告知，“有两名步行者，于抵齐伦图拉渡口后，其中一人称：我乃阿睦尔撒纳。另一系俄罗斯人，送伊渡河。过河后均告失踪。沿该河下游寻觅，得其舟于河湾处，或许阿睦尔撒纳已溺毙等语”。但乾隆皇帝认为“此言绝非确实”，推断俄人欲借阿睦尔撒纳谋求伊犁。勃拉季谢夫临行前，理藩院交给他一封专门针对阿睦尔撒纳问题的书信。信中清廷不再客气，直接戳穿俄方意图，警告俄方其利用阿睦尔撒纳图取伊犁并非明智之举：

> 俄罗斯人窝藏阿睦尔撒纳，盖存日后图伊犁之念矣。阿睦尔撒纳若图伊犁，则伊敢独自前来乎？俄罗斯敢于拨兵派其前来乎？即使拨兵前来，又能成否？该伊犁者乃已隶属朕矣，朕又怎允？此为其一。其二，该阿睦尔撒纳者，乃一鬼蜮之徒，其所到之处，必加害该地而后罢休。对此，俄罗斯等无不知晓。不仅如此，该阿睦尔撒纳荷蒙朕恩，爵以亲王，仍不知足，欲作总台吉。俄罗斯即便协助其图伊犁，然其一旦占领其地，则岂肯感念俄罗斯……今据我副将军兆惠等具奏看来，尔俄罗斯边界人员前事后所言与所咨文书，均不相符。或许已窝藏我逃贼阿睦尔撒纳矣！②

不出乾隆皇帝所料，很快兆惠又奏，“据哈萨克人查报，擒拿贼阿睦尔撒纳时，伊逃脱而出。经跟踪追迹，见伊徒步逃入俄罗斯”。九月二十日理藩院再次发文：

> 今既逃入俄罗斯属实，则望尔衙门务必按照两国友好之道，拿送前来……惟尔界少校等，显系收纳我逃贼阿睦尔撒纳，而不据实相告，却以溺毙于水等言谎报……尔萨纳特衙门承收本院咨文后，倘若仍不拿还叛贼阿睦尔撒纳，或借故搪塞，诡称阿睦尔撒纳未入尔界，委实不可与驻边小官相比……由此将如何被他国邻部耻笑之处，切望熟虑之。③

为换取俄方拿还阿睦尔撒纳，清廷将参与抢劫俄罗斯牧群之乌梁海人安吉、柯斯奎等拿送俄方，但俄方依然未复文。④ 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理藩院发文指责枢密院：

> 为我真正逃贼阿睦尔撒纳事，虽几次咨文敦促，因何至今仍不复文？彼俄罗斯亦为大国，岂有如此办事之理？若欲拿解，即可送来；不欲拿解，亦应明白陈情。如此一再逡巡，即可了结乎？……夫去年当我属和托辉特之贼青衮杂卜叛逃时……已咨行尔萨纳特衙门，而尔萨纳特衙门亦未复文。后闻贼青衮杂卜已为我所擒，尔萨纳特衙门方来文充数。⑤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初十日，再次发文：

> 如再三逡巡并不复文，实不符友好之道，我大国断不致如此。夫尔俄罗斯若有类此逃人窜入我界，我必按原定不互相纳逃人之条例，拿送尔方。若不给还，亦将其情由，爽快复文尔方，绝无如此暧昧不予理睬之理……再，当询问尔捷报人时，只推不知，惟经察伊举止，则显系知之而装作不知。该人只不过一捷报人而已，不必多问，惟将此等情由，亦晓谕此人，令其返回后，转告尔萨纳特衙门遵照而行。⑥

阿睦尔撒纳进入俄境后，被送往托博尔斯克，后患痘而死，对俄方失去利用价值，俄方才

---

①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T.VI. C. 189.

②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113–114 页。

③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118–119 页。

④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121–122 页。

⑤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123–124 页。

⑥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第 2 卷，第 126–127 页。

通知清廷将阿睦尔撒纳尸体运送至恰克图请清廷派人检验。清廷态度有所缓和，表示只要求交出阿睦尔撒纳及随从一二人，先前逃入俄罗斯之乌梁海宰桑郭尔卓辉等可留于彼处。[①] 亲王齐巴克雅兰品尔（齐巴克雅喇木丕勒）会同俄罗斯普尔楚克上尉辨认阿睦尔撒纳尸骸无误，但俄方以萨纳特衙门仅准验看尸体，验毕即葬，未指示归还中方，“况亦无归还尸体之例”等因拒绝将尸体交给清方。[②] 此后数年，清朝与俄方又就阿睦尔撒纳尸体事进行了多次交涉，但未获交还。

正月二十三日，内阁发布通谕，告知阿睦尔撒纳已死，征讨准噶尔战争已告全功。纵观整个交涉过程，乾隆皇帝对俄国的动机洞若观火，但阿睦尔撒纳既死，便不予穷究：

> 俄罗斯之收留叛贼，始未尝不欲抚而用之，及其已死，无可希冀然后献出，亦系其实在情节。然彼即以谨守旧约克全信义为词，自不当逆料其诈，拒而不受，更行深责也。且国家之所期务获者，不过一阿睦尔撒纳耳，今其人已死，其尸已得，准噶尔全局自可以告厥成功。朕惟以大公之心为顺应之举，断不具持我国威诛求过当。万一所献不实，意图欺罔，则其曲自在俄罗斯。彼若妄生事端，则朕可以上告天地下对臣民，再兴师问罪亦未为迟，而无知苟安之徒亦无从议朕为好武矣。

而乾隆皇帝对廷臣曾反对将阿睦尔撒纳穷追到底之事仍耿耿于怀：

> 始议向俄罗斯索取阿睦尔撒纳时，众人之意未必不窃议又生边衅，是总不知驾驭外番之道，示之以谦则愈骄，怵之以威则自畏，此二言若子孙世世能守，实大清国亿万年无疆之庥也。即如汉唐宋明和亲称侄，岁币屡增，是以逊让之极矣，而于边患宁稍救耶？如俄罗斯既已收留叛贼，若不严行索取，彼必不将尸献出。设从史贻直、陈世琯所议，且将迁就隐忍，竟似叛贼一入俄罗斯，遂无可如何者，所谓唾面自干之为，朕甚耻之……向使前后任事诸臣果能迅合机宜，则叛贼自不致逃窜，亦当早为弋获，何至辗转愆期？[③]

足见平定准部是此一阶段清廷的终极目标，乾隆皇帝对捕拿阿睦尔撒纳用心之坚可见一斑。这更加难以让人将俄使出使失败与阿睦尔撒纳问题割裂开来。上文提及清廷抱怨询问阿睦尔撒纳问题时俄国信使佯装不知，显然已经迁怒于勃拉季谢夫。

勃拉季谢夫交涉通航遭拒后，俄国并未终止在尼布楚的秘密考察，又考察了石勒喀河、结雅河等处，并继续从其他地区向尼布楚移民。前文提及的 Ф.И. 索伊莫诺夫 1757 年被任命为西伯利亚省长，其子 М.Ф. 索伊莫诺夫在尼布楚建造了 5 座要塞，直到 1764 年女皇谕令考察转移到伊尔库茨克。[④]1760 年 10 月，俄国向边境地区派遣了配备工程师和炮兵的特种部队，并开始在边境沿线安置哥萨克。1761 年在额尔古纳河北岸加强了涅尔琴斯克、色楞格斯克、库兹涅茨克防线。同年，俄国人在恰克图地区越界设栅，进一步激化矛盾。1762 年，俄廷决定将派遣切尔内舍夫（И.Г.Чернышев）亲王为首的显赫使团前往中国解决冲突，并派遣克罗波托夫（И.И. Кропотов）作为信使先行通报。[⑤] 双方紧张局势暂时缓解。但俄人越界设栅问题始终未能解决，俄国政府又违反条约在恰克图市场对本国商民征税，双方矛盾无法化解，导致清廷关闭恰克图互市，双方关系重新调整，最终在 1768 年签订《恰克图条约》补充条款。

## 四、结语

18 世纪中期中俄两国关于黑龙江通航与清朝逃人问题的交涉，实际上是双方在东亚和中亚

---

①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2 卷，第 128–129 页。

②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2 卷，第 138–139 页。

③ 李静杰主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 · 清代编》第 2 卷，第 131 页。

④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T.VI. C.382.

⑤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T.VI. C.15.

两个场域的一次重要博弈。两国最早于1640年代在黑龙江流域相遇，随着俄国的扩张，双方角逐的场域逐渐扩大，在勃拉季谢夫来华前后拓展到中国西北和中亚地区。这一时期，俄国在远东的主要目标，在于加强对东北亚和北太平洋地区的考察与控制，清廷的核心目标则是彻底解决准部问题和稳定两国边境，清俄博弈也是围绕各自的战略目标在进行。但是双方诉求的错位，预示了使团出使的失败结局。

回到勃拉季谢夫肩负的通航诉求，当代学者米亚斯尼科夫（В.С.Мясников）认为，“由于阿穆尔河的源头在俄国手中，下游土地事实上并未划分，根据国际法，完全可以将其变为由中俄双方共同使用的河流”。[①] 米亚斯尼科夫的观点，实际上体现了中俄学者对尼布楚划界的不同理解，但抛开这一切不谈，再回到当时的历史场域，米亚斯尼科夫对出使结果的理解也还是过于片面，忽视了外交中最重要的双赢原则。俄国政府在筹备使团时，并未考虑到清方诉求，不但未关照到清廷的核心利益，其收纳逃人的行为还实际上干扰了清廷平准目标的实现，并挑战了清廷对准地及乌梁海地区的领土主权，其背后隐藏着俄国进一步南下扩张的野心。俄国政府显然低估了清廷平定准部的决心以及对准俄联合的戒备。勃拉季谢夫在华期间了解到，“这片土地的觊觎者阿睦尔撒纳以其敌对的竞争行为震惊了博格德汗的心脏”，“他担心阿睦尔撒纳某一天会说服俄国皇帝动摇其国内的统治”，“频繁发往枢密院的充满敌意的文书是最好的证明”，“中国皇帝的愿望是不惜一切手段摧毁阿睦尔撒纳，确立达瓦齐为准噶尔的统治者，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得多年困扰中国人的邻居归于平静”。[②] 可惜的是，勃拉季谢夫还是未能看到阿睦尔撒纳问题对其出使结果的关键性影响，而将出使失败单纯归结为清廷担心俄国谋求黑龙江流域的土地，实际上是忽视清廷利益诉求的表现。

双方诉求错位的实质是中俄疆域观念的根本差异。在清廷疆域观念中，地随人归属性明显，部族首领的身份认同关系到边疆地区的归属与稳定，所以在历来中俄交涉中，清廷对关键逃人的追索坚定执着，从17世纪下半叶的根特木尔，[③] 到18世纪中叶的阿睦尔撒纳及乌梁海逃人，皆是如此。从本质上讲，这是清廷对黑龙江流域、准部旧地和乌梁海地区领土主权的坚守。而俄国秉持人随地归，追求实实在在的土地，打到哪里哪里就是边界，很难有固定疆域，直到天然边界。为满足扩张需求，俄国人通常回避或无视清廷的逃人和划界诉求，单方面强调己方需求，从而在中俄交涉中多次出现双方在不同层面上对话的场景。此次勃拉季谢夫出使也是如此。

勃拉季谢夫来华，是中俄继尼布楚谈判后关于黑龙江问题的又一次正式交涉。此次交涉与准部问题纠缠在一起，似乎是1689年中俄局势的再现。当时清廷深受准部问题掣肘，噶尔丹在中俄即将谈判前突袭喀尔喀蒙古，导致康熙皇帝不得不决定将尼布楚让与俄国，并给予其京师贸易特权，以阻止俄准联合。而此次交涉，阿睦尔撒纳问题同样牵动着清廷的神经。但奇怪的是，双方都未将通航问题作为解决问题的筹码，勃拉季谢夫没有提出交出阿睦尔撒纳以换取黑龙江通航，清廷也未曾表示用通航换取阿睦尔撒纳等逃人。事实上从俄使日志来看，阿睦尔撒纳未曾作为两国正式会谈的议题之一，清方仅是私下打探，旁敲侧击，俄方也只是背地里搜集准部情报。这背后的原因在现有史料中未曾体现，或许是由于俄国方面不愿放弃对准部领地的觊觎，而清廷则足够自信无须任何筹码也有能力讨还阿睦尔撒纳，并且在清廷的考量中黑龙江流域主权不容染指。当然，这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此次通航与逃人问题的碰撞，是两国继尼布楚和恰克图谈判之后的又一次较量，形成中俄关系进展的一个新高潮。平准之后，清廷对俄交涉再无准部问题掣肘。此次交涉，也为后续出

---

①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T.VI. C.12.

②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T.VI. C.188–189.

③ 1660年代，清属索伦部首领根特木尔率部众逃入俄国。清廷对此高度重视，多次发文索要，俄方对此置之不理，另一方面却频繁派人来华交涉贸易问题。后因《尼布楚条约》签订，双方不再索要过往逃人，根特木尔终未被拿还。

现的一系列问题埋下伏笔，如恰克图闭市问题，成为俄国属民的汗哈屯乌梁海后期越界返回旧地问题，喀尔喀蒙古的反清倾向及到清末最终“独立”问题，等等。

## References


Fan Mingfang. “Qingchao dui Tangnu Wulianghai diqu de guanxia”(The administration of Tannu Uriankhai region by the Qing Dynasty). *Zhongguo bianjiang shidi yanjiu*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2 (1996).

Khokhlov, A.N. “To the history of the mission of Bratischev to China (1756—1757).”IX conf. Society and the state in China. Theses and reports. CH.2. M., 1978. C.96–101.

Morigawa setsuo. “Waimenggu de guishu eluosi yundong yu dierdai zhebuzundanba hutuketu” (Outer Mongolia’s allegiance to Russia movement and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Jebzundamba Khutughtu). trans. by Zhang Yongjiang, and Ye Xuedong. *Mengguxue xinxi* (Mongolian Studies Information) 2, 3 (1995).

Sarkisova, G.I. “Archival materials about the mission of V. F. Bratischev to Beijing (1756—1757).”XXI conf. Society and State in China. Theses and reports. Book 2. M., 1990. C.76–83.

Tan Ting. “Qianlongchao eshu wulianghai yuejie wenti yanjiu: yi guannianshi shijiao wei zhongxin”(Russian Wulianghai cross–border issues during Qianlong period：perspective of the conceptual history). *Beifang minzu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 1 (2020).

Wang Xilong. *Zhonge guanxi shilue (1917 nianqian)* (Brief history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before 1917). Lanzhou: Gansu wenhua chubanshe, 1995.

Wu Mingming, and Xue Xiaodong. “Qingchao pingding amuersana panluan qijian de zhonge jiaoshe”(The Sino–Russian negotiation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s suppression of the Amuersana Rebellion). *Shanxi dangan* (Shanxi Archives) 2 (2019).

Zhang Weihua, and Sun Xi. *Qingqianqi zhonge guanxi*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Jinan: Shandong jiaoyu chubanshe, 1997.

Zlatkin, I.Y. *Zhungaer hanguo shi (*1635—1758*)* (The history of Junggar Khanate (1635—1758)). trans. Ma Manl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1980.


##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over Navigation on the Amur River and the Return of Dzungar Fugitives in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The Bratischev Mission to China


YE Baichuan (The Insitute of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zhaofc@sina.com ）

SHI Jiaqi (The Insitute of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1835023498@qq.com ）



**Abstrac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Russian government organized several expeditions to explore northeastern Siberia and the North Pacific coast, leading to increasing interest in the Amur River. Thus, Russian government dispatched the Bratischev Mission to China to negotiate navigation issues in 1756-1757. The arrival of the Bratischev Mission coincided with a critical juncture in the Qing Dynasty’s campaign against the Dzungars, during which key leaders such as Amursana and some Hankatun Wulianghai Jaisang fled to Russia. The Qing court determined to obtain the return of these fugitive leaders, while Russia repeatedly harbored them, causing intense turbulence in Sino-Russian relations and ultimately preventing the Bratischev mission from achieving its objectives. The collision between navigation and fugitive issues during this period marked a new peak in Sino-Russian relations and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a series of subsequent problems.



**Keywords**: Qing dynasty, Sino-Russian relations, Amur River, navigation, Amursana